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基/金/丛/书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 基于体制变迁的分析

ZHONGGUO NONGYE LAODONGLI ZHUANYI

JIYU TIZHI BIANQIAN DE FENXI

曹 阳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 基于体制变迁的分析

• 曹 阳 著 •

(D237/02)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鄂)新登字 1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基于体制变迁的分析/曹阳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3

ISBN 7-5622-1712-2

I. 中…

II. 曹…

III. 中国农业—经济—研究

IV. F304.6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基于体制变迁的分析

© 曹 阳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桂子山 邮编:430070)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黄冈日报印刷厂印刷

责任编辑:方正平

责任校对:罗少琳

封面设计:罗明波

督 印:朱 虹

开本:850×1168 1/32

版次:1997年3月第1版

ISBN 7-5622-1712-2/F·91

印数:1—1000

印张:7.5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字数:200千字

定价:10.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历史的透视:人口、粮食与土地	9
第二章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停滞:非城市化和 反城市化的工业化高速推进	37
第三章 双重体制并存下的农业劳动力转移: 机遇、挑战和壁垒	88
第四章 双重经济体制并存下的农村工业化:农村内部 的二元结构和工业内部的二元经济	144
第五章 双重体制并存下的城市化:双轨制人口迁移	185
第六章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前景	215

3
5
3₁
3₂
1
1
1
1

前 言

伴随着经济发展的进程,这种结构变化——农业收入在国民收入中份额的下降,农业劳动力在全社会就业人口中比重的下降——似乎是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或先或后必然要经历的一种规律性现象。正如197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教授所指出的,“我们发现了人平收入和劳动力在农业中的份额存在着一种紧密的负相关关系:人平收入越高,劳动力在农业中的份额越低;反之,劳动力在农业中的份额越高,人平收入则越低。”^①因此,当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有着众多人口以及农业人口高度密集的国家,面临着向“贫困”挑战,奔向“小康”和“富裕”社会的艰巨历史性任务时,降低农业劳动力的份额、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有着庞大人口基数和农业人口高倾斜密集的“超级”发展中大国。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有关资料,截止1993年末,中国大陆的总人口已达到118 517万^②,占全世界总人口的将近五分之一。而且,作为不发达的最重要特征之一,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仍然生活在农村,主要从事农业。虽然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已从1952年的43.1%上升到了1990年的75.7%,农业产值的比重相应地从约56.9%跌到了24.3%;但是,农业劳动力在整个社会劳动力中的比重在1990年仍高达60%,农村人口占整个社会人口的比重则高居73.59%^③。很显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工农业产品产值结构的巨变并没有伴随着相应的劳动力就业结构和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化,工业化的发展与

城市化的发展严重偏离和不同步。这种非均衡的结构变迁又以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分水岭,呈现出鲜明的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以非城市化、甚至反城市化的工业化高速推进为特征;后一个阶段则以“双轨制推进”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独具特色。这两个不同时期不相同的特殊经济体制背景以及与此体制背景相适应的特殊经济发展战略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两种特殊的不均衡结构变化,决定了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在这两个不同时期各自独特的方式与格局。不了解这些经济体制背景以及相应的体制变迁,就无法切实地把握和深刻地理解中国独特的农业劳动力转移进程。

中国饱受过度人口和巨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压力已经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相对众多的人口,中国的土地资源极其宝贵和稀缺。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资料,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在1985年是1.4亩,仅相当于当时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33%,发达国家人均耕地面积的17%和发展中国家人均耕地面积的45%。从1957年到1985年,中国总的耕地面积从16 670亿亩下跌到了14 520亿亩;但是,与此同时,却伴随着一个迅速的人口增长和相应的农业劳动力增长。其结果,每一个农业劳动力所占有的耕地面积从8.7亩下跌到了3.9亩^④。1990年末全国耕地面积又比1985年末减少了1854万亩,而同期人口则增加了8 482万^⑤。这种过度的并且不断增长的农业人口和有限的并且不断减少的农业土地之间的矛盾构成了对中国经济发展、尤其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严重制约。它是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以及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农村隐蔽性失业大量存在的重要原因。我不仅不否认,而且还高度重视这种过度人口与中国至今还贫困落后的高度相关性,但是,不能同意一些人把中国的贫困和落后统统归结于过度人口,或者把过度人口作为中国贫困和落后第一位原因的观点。我要问,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出生率总是要高于发达国家?为什么越穷越有“多生”的刺

激和冲动?要合理地回答这些问题,在很大的程度上似乎也应该归咎于“制度”,或者说“生产方式”的区别:传统的农业经济制度和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有一种内在的刺激人口“高生育”的机制;而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本质上则要求人口的“高”素质而非“高”数量。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⑥

自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发展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发展意味着增长加变化。对于发展来说,变化比增长或许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毋庸置疑,制度变迁又是变化的核心。当然,这里的“制度”,要从广义的角度理解,它包括社会生产的组织结构、动力机制、信息传递系统、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方式、协调手段等等极为广泛的内容。T. W. 舒尔茨则把制度定义为管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在当代中国,制度的变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从传统的农业经济与现代的工业经济并存的二元经济转变到既包括现代工业、又包括现代农业的一元现代经济;另一个方面是从传统的高度集权的中央计划体制转变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这两个方面的“制度转换”既是相对独立的进程,同时又相互依赖、交叉重合和相辅相成。如果说从二元经济并存向现代一元经济的转变是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必然要经历的过程的话,那么,从传统的中央集权的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以及这种体制转换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换的交叉、融合则是中国在现阶段所特有的经济发展进程。正是在这种双重交叉和融合的“制度转换”背景中,中国当代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才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根据 1979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之一的阿瑟·刘易斯爵士的理论,在一个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的经济扩展进程中,传统部门在现存工资制度下有一个无限的劳动力供给^⑦。这暗含有如下一层意思,即无限的剩余劳动力是

传统部门所具有的一个基本特征。因此,二元经济的终结将意味着传统部门(农业)所有的剩余劳动力都将被现代部门(工业)所吸收,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之间的工资差距将填平。可见,在二元经济向一元现代经济转变的进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关键性环节。刘易斯理论,或者说他早期理论的一个重大缺陷是把农业部门仅仅看作是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被动部门,把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仅仅看作是“落后的”农业向“先进的”工业输送劳动力。而事实上,工业化的进程必须高度依赖农业的发展;没有农业及农村经济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工业化以及现代化就会严重受挫。许多国家的经验,尤其是中国的经验,已经充分地证实了这一点。西蒙·库兹涅茨教授说得完全正确,“劳动力和国民生产总值在农业部门的撤出和份额下降的这种结构改变,不仅仅意味着工业革命,即在非农业部门提供了更有效使用资源的重大技术变革的基础;同时,它还意味着农业革命,即在农业部门出现组织形式和生产技术上的重大变革”^⑧。应该说,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和现代化进程中,重新重视农业,是发展经济理论和发展经济政策合乎发展趋势的重大转折和正确选择。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在中国从传统的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同样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传统的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有一个显著的特征,这就是城乡的经济分割,城乡利益格局的行政固定化。农村、农业劳动力被隔绝在城市重工业高速推进的工业化进程之外,农业被有意识地作为容纳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农业剩余劳动力普遍、大量的存在,正是在这一体制之下支撑其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必要支柱。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实践表明,广大农民在解除了体制性束缚之后,发展商品经济的强烈冲动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改革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开辟了广

阔的前景;反过来,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促进了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更进一步地深化改革。

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基于宏观经济制度背景,从体制变迁的角度来探讨有着“中国特色”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我之所以特别强调经济制度背景,强调体制变迁的分析,是因为我确信: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进程中的种种特殊现象和特殊规律,如果离开了制度背景的分析,就不能从社会经济生活的内部机体中找到它们存在的原因,也难以准确地把握它们运动和发展的轨迹。

全书共分为六章。

第一章从历史的角度来讨论传统中国农业经济社会中人口、粮食与土地(耕地)之间的相互关系。从一定的意义上讲,农业剩余劳动力也就是农业劳动力的供给超过了在特定技术条件下耕地所能承受的劳动力负荷(或者说,耕地对劳动力的需求),它是人口和劳力压迫土地的结果。这一章将重点分析在传统的中国农业经济社会制度背景下,人口、粮食与土地之间的内在矛盾以及这一矛盾的发展和运动,由此探讨在这一特定制度背景下,农业剩余劳动力形成的内在原因。

第二章讨论从1949年到1979年的这三十年间,中国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为何处于近乎停滞的状态。这种劳动力就业结构与城乡人口结构三十年间的“高稳定”与工农业产品产值结构的急剧变化,特别是与重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比重中的急剧上升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或者说“非均衡的结构性偏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非均衡的结构性偏离”?这一章的分析将把根本的原因归结于传统的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与这一体制相配套的重工业高速推进的工业化发展模式。

第三章到第五章是本书的核心内容和重点。1979年以后,中国的经济体制在“改革”、“开放”的主潮中出现了重大的改变,但由

于旧体制的消亡和新体制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所以,当代中国形成了新旧两种体制同时并存、交互发生作用的特殊局面。这种独特的双重体制并存的宏观制度背景不可避免地制约、规范和塑造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新格局和新模式,形成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进程中具有“中国特色”的种种规律和特点。

第三章从总体上把握双重体制并存下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新体制为这种转移拓宽了运行空间,使农民有了更多的自主选择的机会;但旧体制依然拖曳着农民的转移,转移进程还面临许多制度性的障碍。这其中最为重要的障碍是以城乡户籍管理制度为核心内容的旧的城乡利益格局。

第四章分析双重体制并存下的“双轨”工业化进程,即城市工业化与农村工业化的“双轨”推进。农村工业化使得农村经济内部出现了一种“亚二元经济”,即传统农业与准现代化的农村工业的并存;同时,工业内部也出现了一种二元格局,即城市现代化工业与农村准现代化工业的并存。

第五章分析双重体制并存下的“双轨”城市化进程,即农村人口迁往城镇的计划性迁移和市场自发性迁移的“双轨”推进。这种城市化进程使得我国的城镇人口分为两大阶层:一部分是有正式城镇户口,享受城镇居民福利待遇的城镇居民;另一部分则是没有正式城镇户口,不能享受城镇居民福利待遇,但工作与生活都在城镇的“准城镇居民”。

第六章将预测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前景。

本书的写作是从1990年6月开始的。当时我作为中国政府资助的访问学者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系与该系系主任、澳大利亚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克莱姆·梯斯顿(Clem Tisdell)教授合作研究中国农业劳动力在双重体制并存下的转移问题。我们二人合作撰写的长篇论文“China's Surplus Agricultural Labour

Force: Its Size, Transfer, Prospects for Absorption and Effects of the Double-Track Economic System”(《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规模、转移、吸纳前景及双重体制下的效应》)后发表在 Asian Economic Journal (《亚洲经济杂志》)1992 年第 6 卷第 2 期第 149—182 页。这篇论文的主要内容构成了本书第三章的基本框架,因此,严格地说来,本书第三章应看作是我与梯斯顿(Tisdell)教授共同的成果。除了第三章以外,梯斯顿(Tisdell)教授对我全书的写作也给予了许多宝贵的建议,这不仅包括我在澳期间,也包括我回国之后。这种真诚的友谊我永志难忘。

昆士兰大学经济系为我在澳延长访问提供了资金赞助,并为我在澳期间的整个研究提供了十分优越的条件,对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回国之后,应刘纯彬先生的邀请,我参与了农业部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与美国东西方人口中心合作的研究课题“中国沿海四省农村劳动力转移与迁移调查报告”的写作(该调查报告发表于《世界经济文汇》1992 年第 5 期第 2—19 页),这次合作研究使我获益匪浅。在此我要感谢本项目中方主持人郭书田先生及刘纯彬先生。

我还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茅于軾教授,在澳期间和回国之后,他都给了我许多宝贵的启示。

我在华中师范大学的许多尊敬的前辈及同事,特别是许祖岷教授、胡琛教授,给了我许多有益的帮助。华中师范大学科研出版基金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部分资金赞助,此外,本书作为我承担的 94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宏观经济运行影响研究”的先期研究成果之一,也得到了该基金的部分赞助。这些是本书能与读者见面的重要因素。在此,我要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汤琢梁女士,她为本书的写作付出了十分辛勤的劳动。

当然,本书的一切错误应由我个人负责。

注释:

- ① 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经济增长和结构,论文选》, *Eco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e, Selected Essays*,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p24.
- ② 中国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1994》,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 年,第 20 页。
- ③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 1991》,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 年,第 25、99、79 页。
- ④ 见《中国统计年鉴 1986》,《中国经济年鉴 1986》。
- ⑤ 中国统计局:《关于“七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
-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 9 月,第 692 页。
- ⑦ 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劳动无限供给的经济发展》,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The Manchester School, 1954 年, Vol. 22, pp. 139—191.
- ⑧ 同①, p28.

第一章 历史的透视：人口、 粮食与土地

传统农业经济是这样一种经济制度：它以传统的、“本质上是保守的”^①经验性生产技术为基础，以自给自足、闭关自守为基本特征，长期维持着一种低水平静止的人口、粮食与耕地的经济均衡。马克思指出：“由于对这种形式来说农业经济和家庭工业的结合是必不可少的，由于农民家庭不依赖于市场和它以外那部分社会的生产运动和历史运动，而形成几乎完全自给自足的生活，总之，由于一般自然经济的性质，所以，这种形式完全适合于为静止的社会状态提供基础，如象我们在亚洲看到的那样。”^②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传统农业经济也曾创造过灿烂的古代农业文明，但由于本质上保守的特征，随着历史发展的进程，它逐步蜕变成了社会进步的桎梏。然而，这种传统农业经济有一种超乎寻常的保持其超稳定结构的自我调节和抗干扰功能，这使得它苟延残喘、死而不僵的生命力特别顽强。这一特点在亚洲社会表现得尤为突出。

中国是世界历史上最早进入农业社会的文明古国之一，它以创造过灿烂的华夏农业文明而自豪。但是，当一些后进入农业社会的国家已走出了传统农业社会，并步上了工业社会、甚至是“后工业社会”的历史新台阶之时，中国仍然被传统的农业经济，或者更准确地说，被传统农业经济的顽强残余生命力所拖曳。这正如马克思所说，“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

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③

“以史为鉴”,是中国圣人贤哲的古训。今天的中国毕竟渊源于昨天的中国,历史不能、也无法一刀两断;而且,“中国人总爱走他们祖先走过的路”^④,特别是祖先们曾经成功过的经验,更容易被凝固化为某种千古不变的教条,引导人们步入歧途。从这个意义上说,了解昨天的中国,有助于了解今天的中国。

“马尔萨斯阴影”与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循环圈

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提出了他的著名的人口理论。他指出人口的增长和人类生存资料的增长有一个基本的趋势,这就是生存资料仅仅以算术级数增长,而人口则以几何级数增长。因此,合乎逻辑地,要想维持生存资料和人口的平衡,就只能依赖战争、瘟疫等积极的抑制(即增加死亡),或者道德约束、晚婚等消极的抑制(即减少生殖)来抑制人口的增长。无疑,这是人类发展一幅悲观而又恐怖的图景。但是,自从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的事实已经驱散了恐怖的“马尔萨斯阴影”。一种反马尔萨斯趋势——生存资料以几何级数增长,而人口则以算术级数增长、甚至零增长或负增长——已在西方世界呈现。然而,如果据此认为历史上根本不曾存在过马尔萨斯趋势,似乎也未免武断。事实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昨天,甚至许多贫穷、落后农业国的今天仍然可见到“马尔萨斯阴影”。例如,根据美国国情普查局《1979年世界人口简要统计》资料,在本世纪60年代,128个发展中国家中有56个国家人口比粮食增长更快;到70年代,这类国家增加到69个。根据联合国粮农

组织资料,1975—1980年间,发展中国家人均粮食产量增长率为 -2.3% ^⑤。在非洲,1970—1980年,其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2.7% ,而粮食产量年平均增长率仅为 1% ^⑥。

马尔萨斯的错误在于他把一定历史条件下、一定制度背景中的人口运动趋势抽象成所谓永恒的“人口自然规律”,他忽视了、也没有看到自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科技进步改造整个历史发展进程的强大震撼力。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特定的制度背景中,马尔萨斯所展示的人口运动趋势仍是难以否认的客观存在。马克思曾指出:“改造农业,因而改造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所有制这种肮脏东西,应该成为未来的变革的基本内容。否则,马尔萨斯神父就是对的了。”^⑦(着重号是引者加的)由此可见,马克思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也没有全盘否定。马克思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运动趋势适应于那种农业未得到改造的社会。这种农业未得到改造的社会,据我的理解,也就是传统的农业经济社会。

中国是传统农业经济持续时间特别长、而且传统农业经济有着特别发达形态的国家。一位具有中国血统的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专著中曾写道,中国的历史是马尔萨斯理论一个强有力的支持^⑧,这番话确有一定道理。

正如保罗·萨缪尔逊教授所强调的,“请注意,马尔萨斯并没有说,人口必将按着这个速度增长。这仅仅是它增长的倾向,如果不加抑制的话。他认为,他的论点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于说明:在一切国家和一切时期,抑制的作用在限制着人口的增长。”^⑨这就是说,马尔萨斯的人口运动趋势是与战争、饥荒等所谓抑制性因素相伴随而交织在一起的。在以传统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古老中国,这种人口运动趋势表现为和平时期的口急剧增长与战争、饥荒等引发的人口急剧下跌交替运行的强烈波动的人口运动循环。例如,公元55年至105年,即东汉光武帝中元二年到和帝元兴2年,国内为一比较和平时期,人口从2100.7万猛增至5325.6万,不到50

年间,人口翻了一番多;唐代,627年到755年,即“贞观之治”到“天宝盛世”,人口从不足300万猛增到891万,100多年间人口增长了近2倍;清朝,1673年到1833年,即康熙12年到道光13年,人口从1939万猛增到39894万,160年间人口增长了近20倍。与这种和平时期人口急剧增长形成强烈对照的是战乱、饥荒引发的人口急剧下跌。157年到280年,即东汉桓帝永寿3年到西晋武帝太康元年,经历过三国战乱,人口从5648.6万猛跌至1616.4万,123年间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二以上;唐代,安史之乱,从755年到760年,即天宝14年到肃宗乾元3年,仅5年时间,人口从5291.9万骤减至1699万,5年时间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二;明清之交,1626年到1655年,人口从5165.5万猛跌至1403.4万^⑩。

许多学者都曾正确地指出过,传统农业经济社会的人口再生产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的所谓“两高一低”类型。但是仅仅指出这一点还不能全面、准确地把握传统农业社会人口再生产的运行轨迹,至少不能全面、准确地把握传统中国的人口再生产运行轨迹。我认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传统中国的“两高一低”的人口再生产类型是大起大落的波动循环模式。在相对和平时期,人口的运动并不呈现为“两高一低”的特征,而是呈现高速增长的势头,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引证的史实所看到的一样。只是由于战争、饥荒等高死亡率的强烈抑制,才使得传统农业经济这个长跨度的历史阶段呈现出所谓的“两高一低”。

图1-1展示了传统农业中国人口运动的波动状况^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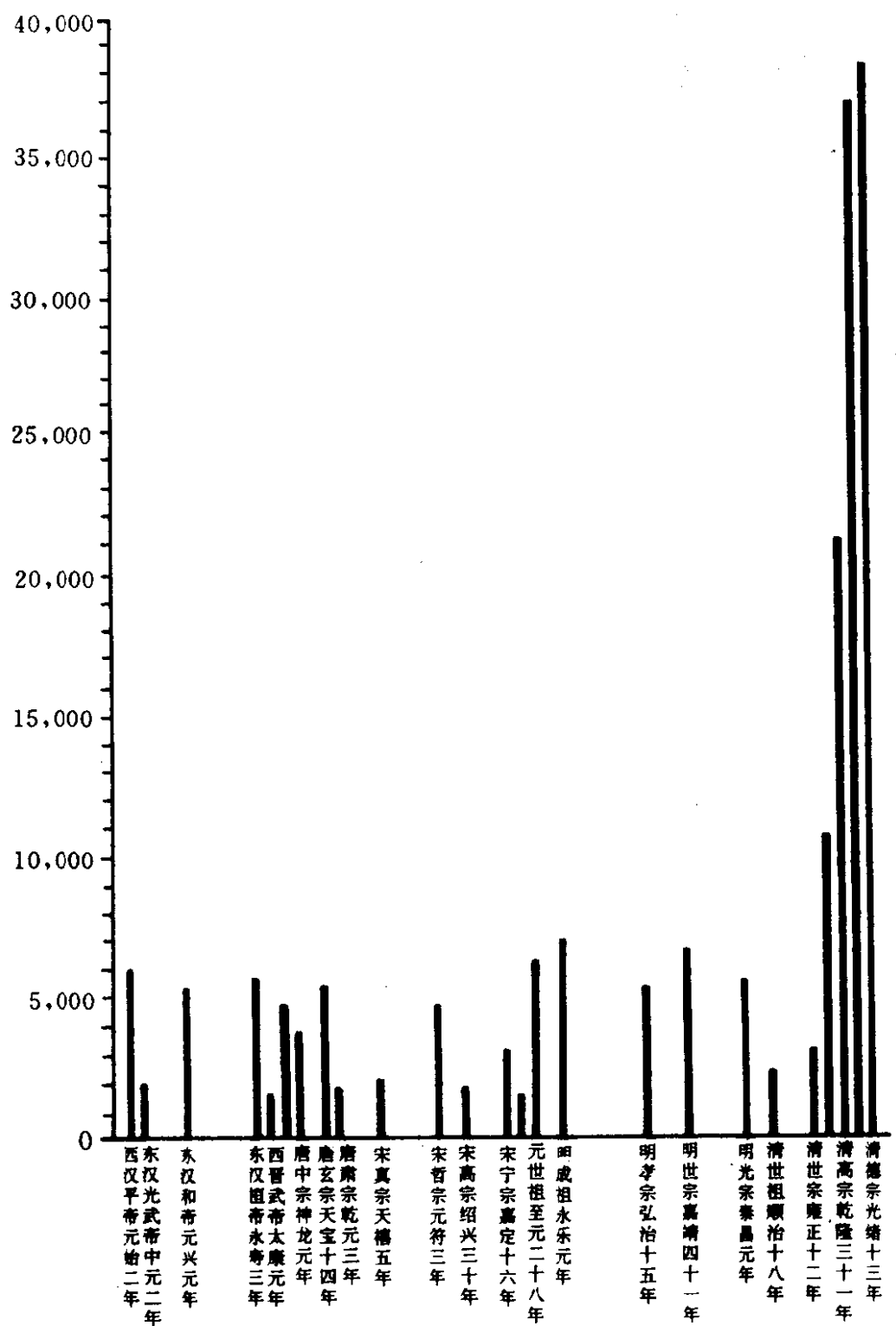


图 1-1 历代人口比较